



安全理事会

第八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九〇五次会议

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达尔马迪卡里先生	(法国)
成员:	阿尔及利亚	本贾马先生
	中国	耿爽先生
	丹麦	拉森女士
	希腊	塞克利斯先生
	圭亚那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夫人
	巴基斯坦	艾哈迈德先生
	巴拿马	莫斯科索先生
	大韩民国	金相禎先生
	俄罗斯联邦	扎博洛茨卡亚女士
	塞拉利昂	斯瓦罗女士
	斯洛文尼亚	日博加尔先生
	索马里	穆罕默德·优素福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里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伊女士

议程项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报情况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928)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报情况

主席 (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 我邀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格兰迪先生发言。

格兰迪先生 (以法语发言)：几年来, 安全理事会邀请我定期就难民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难民署) 任务所涵盖其他人员的总体状况发表看法。因此, 主席先生, 我要感谢你在法国担任主席期间再次欢迎我来到这里发言,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身份发言。这是一种有益的做法, 也是安理会程序的一部分, 我鼓励继续这样做。

(以英语发言)

这是一个战争频发、危机四伏的时刻。从苏丹到乌克兰, 从萨赫勒到缅甸, 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海地, 暴力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点。尽管难民署没有参与联合国在加沙的应急行动, 但那里平民的处境每天都达到新的绝望程度, 我们原本以为情况不会变得更糟。我知道, 我并不是在告诉安理会成员任何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指控——但不幸的是, 这就是我们世界的现实,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统计, 全世界有120起冲突在肆虐, 而且有增无减。助长每一场冲突的是同一个荒谬但强烈的妄想——认为和平是弱者的事, 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不是通过谈判, 而是给敌人造成极大的痛苦, 使他们只有两个选择——投降或被消灭。

因此, 在如此多的人被“只有全面军事胜利才是唯一出路”的观念所蒙蔽的情况下, 不足为奇的是, 保护平民、维护人道主义行为体的中立性以及允许使最基本的援助送达被围困的群众, 这些曾经受到尊重或至少被宣称受到尊重的国际人道法准则被抛在一边, 就如同对为了寻求霸权而被摧毁的成千上万条生命弃如敝履一样。正如教皇方济各所说：“每一场战争不仅代表着政治的失败, 还代表着可耻的投降”。令人悲伤的是, 教皇已逝世, 但他的教诲仍然存在, 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预防和制止战争, 维护和平与安全——这是安全理事会的任务。这是它的首要责任。请各位成员原谅我再说一遍, 安理会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履行这项职责。不过, 我恳求各位成员不要甘心接受外交失败。今天, 我再次代表1.23亿被迫流离失所者在安理会发言, 他们是战争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在许多方面最清楚地体现了冲突和迫害。他们陷入毁灭性的境地, 努力寻求安全, 或至少试图这样做, 但他们仍将继续期盼可以安全返回。我知道他们不会听天由命, 他们也不希望我们听天由命。

以苏丹人民为例，自两年前冲突爆发以来，他们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流离失所。这意味着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被迫逃离家园，这是因为坦率地说，他们的处境难以用语言描述——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疾病、饥饿、猖獗的性暴行、洪水和干旱。这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和社会，在这种环境下，遵守人道主义准则的一切伪装都已被抛弃。本月初，我去了乍得与苏丹交界处。我遇到了刚从战火纷飞的法希尔和扎姆扎姆到达那里的妇女和儿童。他们讲述了种种恐怖的经历，但最主要的是恐惧。达尔富尔的平民经常被阻止逃离危险地区。更糟糕的是，他们被大量作为攻击的目标。各位成员可能已经看到最近关于流离失所者营地及其周边平民遭到袭击的报告，在那里，运送援助不仅与在该国其他地区一样是一项安全和后勤挑战，还是与有毒的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官僚主义噩梦。因此，在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时，这些家庭指着边境说，尽管知道自己将经受种种艰难困苦，但越过边境至少意味着抛开了这种恐惧，这一点意义重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庇护拯救生命的力量了。

苏丹流离失所者人数不断增加，人道主义人员对苏丹人民及其未来所付出的可怕人类代价敲响了警钟。人道主义人员也警告说——几天前，我也在伦敦会议上再次发出警告——冲突的后果现已远远超出苏丹的边界，特别是那些总共收容了300多万苏丹难民的国家，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受影响最大的是乍得和南苏丹，除了难民涌入之外，这两个国家自身也面临巨大挑战，但尽管人道主义资金严重不足，这两个国家仍保持边境开放。最近发出的地区难民呼吁只有11%的资金到位。然而，需求是巨大的。难民抵达时一无所有，由于援助资金不断减少，除了边境附近的乍得社区能够负担得起的援助物资外，他们只得到了所需物资的一小部分。乍得当局不遗余力。乍得的难民法律和政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当局缺乏的是资源，有了资源才能继续接收难民。我们不能抛弃他们。

并非一定要决定收容、保护和援助难民，富裕得多的国家对流离失所问题的反应冷淡得多，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有国家都会做出选择，安理会成员已经听到，我不同意其中许多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难民接收国正在作出正确的决定。它们在尽自己的责任。我们人道主义人员正在当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安理会必须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苏丹冲突各方一天不坐到谈判桌前，战争都会变得更糟糕、更复杂。难民们谈到的不仅仅是两个当事方，而是与主要行为体有松散联系的地方民兵，它们数量激增，实施暴力虐待。

这种致命的混乱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点。我们本应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或阿富汗战争中汲取教训，许多安理会成员至今仍在应对这些战争的外溢影响。因为，如果目前的态势——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援助不断减少——不改变，那么我们就不要抱有幻想：苏丹战争的破坏稳定影响，包括人口流动的规模，将会扩大。今天在利比亚已经有20多万苏丹人，其中许多人可能会前往欧洲。

我也非常关切地注视着乌克兰的最新事态发展——我相信安理会也是如此——自2022年以来，我已六次访问这个国家。今年1月，我刚刚访问了基辅和苏梅，就在过去几天，这两个城市再次遭到了毁灭性袭击。我看到，这场战争继续给乌克兰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群体——老人、儿童和家庭——造成可怕的损失，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仍然令人钦佩。难民署正与乌克兰政府

和当地民间社会伙伴密切合作,帮助减轻痛苦,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正常状态和希望。

但显然,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人民需要的是公正的和平。我的职责不是描述公正的和平是什么样子,而是提醒所有参与和平努力的人不要忘记1000多万乌克兰流离失所者的困境,其中700万人是难民。必须继续为他们最终返回自己的社区制定计划。但是,除非他们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内获得安全保障——除非宣布袭击将至的警报声真正停止,除非他们能够获得体面的住房、服务和工作,除非他们相信和平的条件对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来说是持久的,否则他们不会返回。这是结束人道主义危机的关键考量:安全和自力更生。两者都必须给人以持久的感觉。

寻找解决方案是艰苦的工作,需要承诺和妥协。和平无法被动地实现,仅靠消耗,也无法盼来和平。因此,当出现意想不到的机遇时,我们更要做好准备,抓住机遇,在深思熟虑后承担风险。例如,过去八年来,缅甸问题的应对措施一直停滞不前。缅军与不同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给整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和大规模流离失所,一个月前发生的可怕地震加剧了这一局势。尤其是罗兴亚少数群体的困境变得更加严重。在若开邦与若开民族军进行的战斗尤为惨烈——如今有120万罗兴亚人沦为难民,他们大多居住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周边的营地中。我们必须感谢孟加拉国及其人民多年来为他们提供庇护。但是,罗兴亚难民在营地中饱受煎熬,他们没有工作,被剥夺了能动性,完全依赖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援助越来越不稳定。半数难民的年龄在18岁以下。用首席顾问尤努斯的话说,他们与机会的连接被切断,却通过互联网与世界相连。难怪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不得不踏上危险的海上旅程去寻找机会,也难怪那些想要招募作战人员的人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现在有机会打破这种危险的惰性。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已选择与若开邦冲突各方进行接触,在当地寻找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理应在当地找到。许多人会立即说,由于我们所知道的种种原因,今天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已经流了太多的血,歧视仍在继续,有太多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平衡。许多人会说,根本原因永远不会得到有效解决,情况很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就罗兴亚局势而言,我们已经在这条停滞不前的道路上走了八年——这是一条死胡同。

从寻求解决罗兴亚人困境的角度出发,为了开始重新创造难民回返的条件,与各方对话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包括难民署在内的人道主义机构才能重建当地办事处,重新开始安全、自由地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救济。反过来,一旦若开邦的安全局势允许,这也将为重新开始讨论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的最终回返——我强调:安全、有尊严的自愿回返——提供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也可以争取其他合法权利。尽管肯定希望渺茫,但我敦促安理会打破常规思维,冒一些风险。我希望安理会继续大力关注缅甸局势,包括罗兴亚人的困境,并期待计划于9月在纽约召开的会议。

其他可能的转折性事件甚至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周五,叙利亚的新国旗在联合国升起。对所有叙利亚人来说,这是多么有力的象征!在叙利亚,还有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道主义和流离失所危机,而现在可能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但

要实现这一目标,安理会成员都必须优先考虑叙利亚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积年的政治考量,坦率说,有的政治考量已陈腐过时了。这还意味着要承担适当风险。当然,我们不能太天真——许多挑战依然存在。周五,安理会成员在这里听取了希巴尼部长对这些挑战的描述(见S/PV.9904)。14年战争造成的破坏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克服。但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希望的火花,包括对于今天仍然流离失所的数百万叙利亚人来说,其中450万人是流落邻国的难民。

自2024年12月8日以来,随着境内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回返人数上升,这些难民人数一直在缓慢却稳步下降。我们注意到从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返回的人数也有所上升。我们估计,已有100多万人返回,而且最近调查显示,可能还有更多人返回。

他们是会留在叙利亚,还是不幸地再次迁离——包括迁往欧洲和其他地方——当然取决于当局,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安理会成员是否有意愿承担风险;是否有意愿放松制裁,认真支持早期恢复,刺激私营部门和其他方面的投资:简言之,创造条件,以便在叙利亚人民开始重建社区时能够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基本要素——安全、水、电、教育和经济机会。为了尽量减少回返叙利亚人所冒的风险,我请成员们自己承担一些风险——政治和经济风险。是的,这也必须意味着持续的、更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目前,这种援助正在急剧减少,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事实上,我不能不在结束发言之前提请安理会注意援助资金的危急形势。就在有希望最终解决几个流离失所危机——不仅在叙利亚,还有在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国——的时候,我们却看到援助、多边主义、甚至拯救生命的援助都在缩减。我们听到有人说要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增加国防开支——当然,这些都是合理关切,也是正当的国家追求。但是,这些与援助并不冲突,而是恰恰相反。

于是,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同样的论点,试图说服捐助国,让它们相信一个我们都能清楚看到的现实:援助就是稳定。冻结或削减援助预算已对数百万人的生命产生了致命后果。这意味着,除其他外,让流离失所者听天由命,剥夺有时是非常脆弱的东道国的支持,并最终破坏安理会成员国自身的稳定。

事实上,多边主义——包括多边援助——加强这种稳定,而且是解决危机——包括被迫流离失所问题——所不可或缺的。我的话可能听上去很不合时宜,但是,我从事人道主义工作40多年、在现任岗位工作近10年,我仍然认为,只有坐到同一张桌子旁,才能听到所有的声音——无论强弱。对于那些认为多边主义具有压制性、过程缓慢、与自己的优先事项不一致的人来说,我希望他们认识到,离开辩论并不意味着讨论就会结束。讨论不会结束,但效果和说服力会减弱。我们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参与讨论。

难民问题是这一共同任务最佳的例证之一,因为如果安理会成员们环顾一下这个会议厅,就会像我一样看到,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以何种方式。努力争取自由;抗击压迫;因战争、暴力和迫害而被迫离开家园;为被迫逃难者提供避难——这些是每个国家历史中常见的现象;以复

杂而独特的方式深深融入到各国的传统和价值观中。成员们产生过难民, 收容过寻求避难者。

现在, 安理会成员们坐在这张桌子旁, 肩负结束战争和带来和平的责任, 他们必须成功, 不仅是为了所有流离失所者和依靠他们的人, 也是为了他们自己。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格兰迪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本贾马先生 (阿尔及利亚) (以法语发言): 我衷心感谢菲利普·格兰迪先生作了全面通报。我们还赞扬他在支持和保护全球难民方面坚定不移、尽心竭力。

流离失所危机每年都在加深。流离失所者人数正稳步攀升, 这是由于多重且往往相互重叠的原因, 尤其是武装冲突。这种惊人的增长与国际资金减少同时发生, 导致数百万弱势个人无法获得拯救生命的援助。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 它反映出在更大范围内都未能满足流离失所者的需求。解决这一失败是国际社会必须公平承担的共同责任。

在这方面, 必须重申我们在通过《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时集体作出的承诺, 该契约呼吁公平、可预测地分担负担和责任, 并大力支持收容社区。令人遗憾的是, 在这一人类努力中, 难民和东道社区都常常感到被遗弃。而我们是有限的支持承担巨大的负担。

对阿尔及利亚来说, 预防仍是最有效的战略。必须解决流离失所现象的根源问题, 包括武装冲突、外国占领和不发达状况。这要求采取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面向发展的多方面办法。与此同时, 我们正在目睹的全球难民危机要求我们采取紧急、协调一致和持续的行动。在这方面, 我想强调以下关键要素。

第一, 必须确保对难民的保护。难民作为一个特别脆弱的群体, 包括妇女和女童, 根据国际难民法有权得到保护。然而, 近年来, 我们目睹了多起侵犯这一权利的事件。巴勒斯坦难民, 特别是在加沙和西岸的难民, 遭受了不人道的待遇, 一再被迫流离失所, 包括难民营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国际社会, 特别是安理会, 必须履行其法律和道义义务, 保护这些人, 维护国际人道法。

第二, 必须调集充足和可预测的资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其他人道主义行为体目前面临的财政危机严重限制了它们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这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强调, 大多数收容难民的国家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提供避难所和基本服务的努力应当得到捐助界的相应资助。国际支助决不能被视为施舍, 而应被视为基于国际团结原则的全球共同责任的一部分。它也不应受制于政治算计和条件, 或被用作外交上讨价还价的工具。

第三, 必须打击针对难民的假消息和仇外心理。误导宣传和煽动性言论使难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助长了收容国的仇外心理和暴力。必须反击这些有害言论。提高公众认识的运动至关重要, 有助于确保对收容社区进行宣传教育, 并确保难民在根据国际法等待持久解决办法期间得到保护。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阿尔及利亚一直在廷杜夫难民营收容撒哈拉威难民。这些人因摩洛哥占领其家园而被迫流离失所。在这50年期间,尽管面临巨大挑战,阿尔及利亚与联合国各机构和人道主义伙伴方合作,始终确保撒哈拉威难民能够获得基本服务。然而,必须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这必须包括使撒哈拉威难民能够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规定,通过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关于撒哈拉威难民未来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而且必须始终在他们手中。撒哈拉威难民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受到损害或成为交易对象。

最后,我要强调一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允许难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他们作为人的权利。他们安全、有尊严和自愿地返回家园也是国际难民法的基石,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决不能打折扣。让我们共同努力,维护难民的尊严,让他们能够充分享有权利。

莫斯科索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欢迎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先生举行本次年度会议,讨论危机局势下的难民处境。

(以英语发言)

我们注意到他紧急呼吁实现和平,并呼吁安理会在他所说的这个“战争季节”成功履行自身任务。巴拿马认为,和平属于强者,而不是弱者。

(以西班牙语发言)

国际社会目前正面临着空前规模的流离失所局势。全世界有1.2亿多人,包括难民、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其他需要国际保护的人,被迫逃离家园。这些数字表明,在过去12年里,逃离人数有增无减,主要驱动因素是武装冲突、广泛的暴力、迫害、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一悲剧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人类在流离失所的各个阶段都在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风险,导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并使重要的人道主义服务和联合国机构提供照护的能力捉襟见肘。因此,我们重申对《全球难民契约》的承诺,并愿意与多边系统密切合作,为处于这种情况下的4370多万人提供援助。乌克兰战争等局势摧毁了民用基础设施,迫使民众逃离家园,寻找安全、保护和援助。自2022年2月以来,已有37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世界各地有近700万难民。我们也不能忽视刚果民主共和国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特别是在北基伍、南基伍和伊图里省。数十年的冲突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造成670多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此外还有99万刚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非洲各国收容。

要防止不稳定局势蔓延,就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给予关注和提供资源。如果该地区的所有冲突都汇聚到一起,就有可能引发前所未有的跨国危机。

苏丹1200多万人不得不逃离家园。其中约300万人逃离该国前往邻国寻求安全和保护。数百万儿童有很多粮食缺乏保障,该国十多个地区正处于饥荒边缘。事实上,由于人道主义机构的准入受到限制,北达尔富尔州扎姆扎姆难民营中普遍存在饥荒。

巴拿马为今天为了寻找他或她永远都不应该缺少的东西——家园、安全和尊严而穿越丛林、海洋和沙漠的每一个孩子大声疾呼。儿童没有国界，对他们的保护也没有国界。儿童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 30%，但却占流离失所者的40%，这说明儿童在危机面前极其脆弱。

巴拿马坚信，我们的每一项应对措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尊严为指导。

考虑到全世界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委内瑞拉人，我们不能忽视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形势、民主真空和普遍的不安全状况正在加剧整个美洲的移民危机。本区域正在经历充满挑战的时刻，除了本已不堪承受的全球移民危机外，缺乏民主保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增加——例如海地发生的情况——是加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流离失所者空前增加的因素。

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世界人口的保护和福祉还需要保护环境，并将此作为预防冲突和建设持久和平工作的一部分，确保自然资源的开采不会对环境容量造成压力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应特别关注女性难民，她们经常有可能遭受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贩运、性剥削、强迫婚姻以及被排除在卫生、教育和就业等基本服务之外。缺乏证件令她们的处境变得更糟，使其被排除在保护系统之外。在营地或庇护所，往往没有适当的安全措施或性别敏感机制，这进一步增加了她们的脆弱性。

巴拿马认为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国际保护是一个共同价值观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加倍努力，扭转目前人道主义资金削减的趋势，并加强区域机制，以便更公平地分担责任。我们重申对这些原则的承诺，并重申我们决心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促进以保护人权为重点的全球应对措施。

扎博洛茨卡娅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先生就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国际援助这一迫切问题作通报。

鉴于世界各地人道主义危机规模空前，协助难民和处理难民问题尤为重要。2024年，为求生而被迫逃离家园和本国的人数创下了记录，情况凄惨。

处理被迫流离失所危机，就必须首先考虑加沙局势。狂轰乱炸已经迫使100多万加沙人为逃生而逃离家园。即使找到了避难所和避风港，赤贫者仍然面临致命危险。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对平民目标进行袭击，包括难民营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其他避难设施，已造成742人死亡、2400多人受伤。无私地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的工作人员也正在死去。自以色列国防军启动军事行动以来，近东救济工程处已有290多名工作人员遇害。

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程度与日俱增。以色列当局继续阻止人道援助进入。近60天来，加沙的食品和药品进口一直受阻，供应耗尽。人道组织对迫在眉睫的饥荒敲响了警钟，尤其是儿童饥荒。加沙地带没有水、食物或燃料，得以逃离炮击的人面临饥饿、传染病，而且缺乏足够的医疗服务。

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伙伴组织近东救济工程处尽管依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和威胁，包括目前急需的资金被削减，仍

然继续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我们知道巴勒斯坦难民不直接属于难民署的职责范围,但我们希望高级专员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呼吁以色列遵守其国际义务。

加沙局势和近东救济工程处受到迫害凸显了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政治化的可悲趋势。这在援助难民的人道主义计划的筹资方面尤其明显。西方国家挑起了全世界的大部分冲突,从而引发了难民逃亡,却非常不愿意资助联合国难民署援助难民,包括来自阿富汗、苏丹和许多其他冲突国家的难民的项目。西方国家特别热衷于将抵达其境内的寻求庇护者赶回发展中国家。

在此背景下,“黄金十亿人”所在的国家不断对乌克兰难民的处境发出警告,却未提及其中相当一部分难民已经转向俄罗斯。有人正在搞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将世界分为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

叙利亚难民自愿回返问题也呈现政治化趋势。多年来,西方一直阻止他们返回家园,包括阻碍人道主义项目的实施。西方现在称其确实向叙利亚人提供了援助,却继续对大马士革实施单方面制裁,这些制裁主要影响到普通公民。臭名昭著的霍尔难民营和罗季难民营的情况尚不清楚,数千名逃离拉卡、哈金和巴古兹地毯式轰炸的妇女和儿童在这些难民营中避难。我们相信难民署将继续协助采取举措,促进叙利亚难民自愿返回家园。

我们注意到难民署为向乌克兰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所做的努力。我们要回顾,2014年乌克兰政变后,数十万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俄语居民逃离乌克兰前往俄罗斯。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顿巴斯和平城镇的炮击有增无减,导致从乌克兰到俄罗斯的大规模逃亡在随后几年持续发生。约500万人在俄罗斯各地避难,俄方正在继续全力收容安置并为其提供全面援助。难民署驻莫斯科代表可以亲眼看到俄罗斯各地为确保难民体面的生活条件而开展的有效工作。

在难民状况方面,非洲大陆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尽管面临各种经济困难,但非洲国家多年来为全世界树立了团结互助、援助流离失所者的榜样,这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非洲国家完全有权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我们与其他人一样,对苏丹人民因持续两年多的武装冲突而面临的困难处境感到关切。难民外流的负担由所有邻国承担,包括埃及、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已接纳了约200万苏丹人。苏丹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已接近1100万。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系统加强对苏丹政府的援助,以解决各种人道主义问题。请允许我强调,与苏丹政府建立合作十分重要,因为苏丹政府对实现国家局势正常化、加强安全以及解决与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相关的各种问题负有全部责任。

最后,我再次提请各位成员关注地中海难民的困境。年复一年,仍有许多试图去往欧洲的人葬身地中海。骇人听闻的海上死亡悲剧继续频频发生。与此同时,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西欧提供援助或作出反应的任何尝试。欧洲国家非但没有帮助那些身陷困境的人,反而故意将他们赶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导致他们必死无疑。它们继续干涉那些援助难民的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纯粹的人道角度来看,这种情况都是不可容忍的。人们正在死去,却没有人为此负

责。显然,除非根据国际海事法准则为获救难民和在海上被拦截的难民指定安全港口,使他们能够登陆,否则情况不会改变。我们呼吁高级专员继续关注地中海地区,并继续敦促欧洲联盟履行其国际义务,展现责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最后,我们支持格兰迪先生关于尽管存在财政困难,但仍有必要继续为人道主义努力提供资金的呼吁。就我国而言,我们要指出,尽管面临各种财政限制,但俄罗斯上周还是设法拨款200万美元,支持难民署的活动。

金相禎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菲利波·格兰迪高级专员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通报。他今天的简报确实令人触动。

我记得,去年在安全理事会,高级专员描述了被迫流离失所方面前所未有的局势(见S/PV.9641)。正如他今天所描述的那样,自那时以来,危机进一步恶化,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已超过1.22亿。这些数字只反映了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灾难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缺乏集体努力和采取行动的意愿。有鉴于此,我愿谈以下四点。

第一,安理会应发挥领导力,开展更多以行动为导向的合作,从而消除导致被迫流离失所的直接原因。被迫流离失所是和平与安全崩溃的直接后果,使人们感到不安全、得不到保护。当结束冲突遥不可及时,根据国际人道法,我们有义务在战时保护平民。然而,这一责任正日益被忽视,最近持续不断的冲突,包括加沙、苏丹和乌克兰的冲突,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发出一致的声音,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安理会还应酌情考虑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以确保有关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第二,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那些因为基本人权遭到系统性侵犯和面临人道主义风险别无选择,只能逃离家园的人,以及那些如果被迫返回就有可能遭受迫害、酷刑或其他暴行的人。朝鲜逃亡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此,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尊重《难民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规定的推回原则。

第三,在所有联合国机构都面临极其严重的财政制约的时候,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必须帮助人道主义工作者和东道国以迅速和灵活的方式处理人道主义危机。我国政府加入了提高灵活性的努力,去年将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年度未指定用途捐款增加了五倍,并决定今年维持相同水平。在这方面,我建议难民署使其资金来源多样化,以加强其财政基础的韧性。来自不同利益攸关方的供资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大韩民国的例子就是如此,因为来自私人捐助方的捐款占我们向难民署提供的资金总额的近一半。

最后,我们应提供持续的支持,直至被迫流离失所问题通过难民安全、自愿和有尊严的回返最终得到解决,使他们可持续地重返原籍国或在第三国重新安置。我们可以以叙利亚为例,它是世界上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欢迎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解决叙利亚难民状况的第一步。坚持不懈地努力维护法治、促进正义与和解以及保障人权,是确保自愿回返者能够

成功地重新融入其社区的关键所在。这些进展不仅将惠及叙利亚及其邻国，也有利于该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

总之，正如1951年《难民公约》明确阐述的那样，没有国际合作就无法解决难民问题，而针对这一问题的有效协调有赖于各国与难民署的合作。大韩民国仍然致力于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解决难民问题。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夫人（圭亚那）（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格兰迪高级专员今天的通报和他对当前流离失所危机所作的坦率评估。圭亚那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重要工作，并赞扬格兰迪高级专员及其团队在挑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继续向世界各地数百万流离失所者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和保护。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这导致武装暴力和流离失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24年，超过1.2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全球概况显示，在美洲，由于从国外贩入的武器，海地帮派暴力不断恶化，导致100多万人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在非洲，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迫使大约30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离开家园。在亚洲，缅甸境内有350多万人流离失所。正如格兰迪高级专员提醒我们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大陆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已迫使1000多万乌克兰人离开家园，此外，我们仍在目睹加沙不断出现流离失所现象。

冲突引发的流离失所和非自愿安置的增加对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构成了重大挑战，它们已经在艰难应对全球供资捉襟见肘的问题。2025年，估计需要102亿美元来为预计超过1.39亿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提供救生保护和援助。这些数字十分惊人，需要我们紧急关注，特别是因为，需求和承诺之间的缺口继续扩大，导致人道主义部门严重筹资不足。

我们当中没有谁能够免受目前流离失所危机的影响——无论是直接影响，即人们越过我们的国界涌入，还是间接影响，即它所产生的的一系列副作用。我们都受到影响。对于收容了世界上71%的难民和其他需要国际保护的人的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它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预算受到的影响十分严重。仅在卫生部门，一份关于将难民纳入国家卫生服务的全球成本分析估计，如果要这样做，每年将需要110亿美元。

加快全球应对措施必要性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应对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需求。与此同时，必须更加紧迫地应对冲突和流离失所的驱动因素。大规模流离失所只是战争、暴力和经济不稳定这些恶疾的症状之一。气候变化也在成为流离失所的一大驱动因素。根据《2024年全球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报告》，过去10年，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导致2.2亿人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此外，由于气候灾害影响到目的国，可选的逃离目标变得稀少，造成了旷日持久的流离失所危机。我们还必须承认移民现象是存在的，它既是冲突的结果，也是冲突的驱动因素。

如果我们不能应对这些挑战，将会造成全球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日益恶化的悲剧。在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箱中，难民署是关键。然而，该机构无法单独行动。它需要所有会员国的合作和支持，必须配备必要的资源，以有效履行任务。这包括财政资源。我们注意到，截至2月，难民署仅收到所需资金的14%。

圭亚那还继续主张采取全面的战略方法来应对发展赤字，这是绝大多数冲突的根源。不作为以及不优先重视和投资于发展和预防冲突的代价实在太高。

最后，值得重申，难民署及其伙伴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让它们能够继续提供基本救生服务，如住所、水、保健和教育。圭亚那致力于维持和进一步加强我们与难民署的伙伴关系，并将继续倡导增加对该机构的支持。

耿爽先生(中国)：我感谢格兰蒂高专所作的通报。

联合国难民署长期在冲突战乱地区坚守，为数百万难民提供援助，中方对此表示敬意，将继续支持联合国难民署推进崇高的人道事业。我也愿借此机会对格兰蒂高专过去几年的工作表示赞赏。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地缘政治高度紧张，单边霸凌持续不断，世界经济遭受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难民形势日益严峻、挑战愈加突出。根据难民署的报告，全球有超过1.2亿人被迫流离失所，相关数字已连续12年上升。大量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难以获得救助，饱受饥饿与流离之苦，令人痛心。

解决难民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全面和系统的应对之策。近期，有关国家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多家人道机构被迫减少援助活动，这无疑是对难民救济事业的严重冲击，更多难民可能因此陷入颠沛流离。当务之急是尽快筹措资金，向陷入困境的难民施以援手。中低收入国家接纳了难民总数的70%。中方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展现责任担当，履行援助承诺，向难民接收国及多边人道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

战火和冲突是人们被迫逃离家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安理会应推动各方停火止暴，开启对话谈判，寻求政治解决。有关国家应放弃在国际上制造对立、挑起冲突，放弃单边主义作法和霸道、霸凌行径。各方要支持冲突后国家加快恢复重建，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为难民早日重返家园创造条件。

刚才格兰蒂高专和各位同事都提及全球多个地区面临的严峻人道挑战，中方对此感同身受。在巴勒斯坦，新一轮冲突导致加沙200多万饱受折磨的民众面临严峻的人道危机。实现停火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国际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针对加沙民众的强制迁徙，以及吞并加沙或者西岸土地的企图。在叙利亚，局势反复动荡造成严重的难民问题，给地区和国家稳定发展带来挑战。叙利亚当局应加快推进包容政治进程，切实履行反恐义务，尽快恢复叙利亚的和平稳定，推动难民回返。

在非洲大陆，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政治动荡和发展赤字相互叠加、相互交织，人道形势尤为严峻，仅苏丹、刚果(金)、萨赫勒等地区就有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国际社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从政治、安全、发展、人道等多方面入手，解决非洲难民问题。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将资源优先向非洲倾斜，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作为《难民地位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中方始终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参与难民领域的国际合作，通过双多边渠道为有关国家应对难民危机提供援

助。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难民保护体系、推动解决难民问题贡献力量。

谢伊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的通报。

正如他确实强调的那样,在近年来冲突增加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未能达成终止被迫流离失所的必要政治解决办法。正如我们以前在本会议厅中所说,现在是我们让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回归其最初宗旨的时候,那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通过和平解决争端。这是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应尽的职责——规划一条能够结束可怕冲突的前进道路。

但是,任何国家均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联合国的存在是为了采取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要求集体承担责任。所有会员国需要更好地分担对冲突做出人道主义响应的负担。几十年来,美国一直不成比例地承担了这种重负。此外,我们重申,应对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应该把国家主权、边界安全以及法治的核心原则作为指导。

过去一年中,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缅甸等国的冲突恶化。

关于以色列和 Hamas 之间的战争,没有人想看到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忍受饥渴。美国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在有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流动,以确保援助不会被 Hamas 或者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恐怖组织挪用、抢掠或者滥用。但是我们要记住, Hamas 对其 2023 年 10 月 7 日发动的战争负有全部责任,那一天它制造了大屠杀以来对犹太人最严重的屠杀,还绑架了 250 多人质, Hamas 也对 3 月份敌对行动的恢复负有全部责任,因为此前 Hamas 拒绝了多项提议。

即使在当前的冲突期间,也有理由抱有些许希望。在叙利亚,随着阿萨德的离开,数百万看到祖国未来前景的难民重燃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留在家乡附近、没有试图踏上前往欧洲的危险旅程的难民已经返回家园。

美国寻求的未来是:叙利亚实现稳定,尊重本国民众的人权与自由,拒绝恐怖主义和破坏稳定的伊朗势力,并且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我们相信,许多叙利亚难民和移民对自己的国家抱有类似的希望。

谈到欧洲,安理会曾呼吁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美国已为实现这种和平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如果能达成持久解决方案,数百万乌克兰人将能够返回家园。

在这些冲突中实现持久和平将为千百万流离失所者安全地返回家园、繁荣地区经济奠定基础。我们呼吁安理会加倍努力,解决和制止导致长期流离失所的危机。

拉森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先生在其整个任期内表现出杰出的领导魄力。丹麦全力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高度钦佩所有不懈努力帮助世界上的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人们。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关头。正如我们今天从高级专员那里听到的那样，世界各地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已达到惊人的1.23亿。妇女和女童依然是苦难最深重的群体。

流离失所危机的驱动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冲突扩散和旷日持久，还有国际人道法的文字与精神遭到普遍漠视。

气候冲击的影响也在继续加剧。这给21世纪的人道主义行动和精诚团结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缅甸到叙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我们看到，暴力和针对平民及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流离失所达到惊人的程度。

苏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所在地，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超过60%的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在乌克兰，攻击民用基础设施、污染农田以及反复打击居民区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难民和流离失所危机；近700万人跨界逃离，另有37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在加沙，主要由难民组成的全体民众被剥夺人道主义援助。保健体系已经崩溃。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被定为犯罪组织。人道主义本身成为攻击的目标。

有鉴于这些令人深感不安的例子，请允许我谈三点看法。

首先，必须使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伙伴能够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支持。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联合国必须能够安全和不受阻碍地接触到需要帮助的人们。这是采取任何有意义的响应措施的根本前提，也是冲突各方的义务。在这方面，安理会和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明确反对故意使用官僚和行政手段从中阻挠、拒绝这种准入的行为。从加沙到乌克兰和苏丹，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采取这些手段是不能容忍的。在极端情况下，丹麦认为，安理会有义务利用供其处置的工具来克服这些障碍。

其次，我骄傲地表示，丹麦目前是难民署的第四大捐助方，也是更广泛的人道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捐助方。但是，正如紧急救济协调员所说的那样，人道主义体系正在重置。难民署本身正在进行重大的组织调整，这将影响其核心能力和业务覆盖面。在这个变革时期的自始至终，我们必须集体支持难民署，更多地侧重于保护、持久解决方案以及应急响应，从而维持其履行核心任务的能力。

未来几年，我们不仅需要加大对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支持，还需要加大对收留他们的东道国和社区的支持。简而言之，我们将需要做到事半功倍，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超出传统的人道主义做法。不过，采取这些做法时必须坚持独立、公正、中立以及人道的人道主义核心原则。同样，这些做法绝不能损害人道主义行动和团结互助所依据的道德操守。

最后, 要想避免一个混乱的世界, 安理会就必须不仅处理当前危机的人道主义表象, 而且处理其背后的政治驱动因素——正如高级专员所倡导的那样, 我们必须勇担风险。

安理会应该继续侧重于寻求冲突的政治解决, 同时确保讲求原则的人道主义行动始终得到保障与支持。人道主义义务绝不能被作为政治谈判的条件或者受其制约。

最后, 丹麦重申, 我们坚决支持联合国难民署和《全球难民契约》。该机构代表了多边主义的精华——共同承诺支持那些被残忍驱逐、剥夺一切的人。国际社会可以继续依靠丹麦发挥自己的作用。

日博加尔先生 (斯洛文尼亚) (以英语发言): 我也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先生通报和介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难民署) 的工作和最新情况。我们还要感谢他从身为平民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视角指导我们应对多起冲突。我们感谢他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发出充满激情的呼吁。

今年, 被迫离开家园的男女老幼人数之多创下记录。

随着整个社会、如加沙以迅猛的速度被连根拔起, 新的纪录不断被打破。

在安理会呼吁和平的同时, 乌克兰人却继续在逃离轰炸。

正如许多同事已经回顾的那样, 仅苏丹就有近1300万人——全国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在四处漂泊, 寻求安全。这不仅仅是数字, 更展现出处于险境的世界, 展现出人们被推入贫困和饥饿, 面临疾病、暴力、剥削和虐待的风险。对于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来说, 还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风险增加。

在所有这些破碎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一个真相: 对国际人道法的无情漠视。我们正在目睹它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受到侵蚀。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保护过去75年来一直指导人类的法律。

我国代表团谨概述三点, 即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为制止和扭转这些危险趋势而应努力的三个方向。

第一是拯救生命、保护人民和提供援助。我们要求随时随地为平民提供绝对保护。这种保护延伸到每一位人道主义工作者、每一位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 无论他们是从远方坐飞机抵达, 还是从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招募。人道主义准入不是一个酌情处理的问题, 而是每个国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法律义务。

第二是直面气候流离失所风暴。同圭亚那一样, 我们要指出气候变化这一悄无声息、挥之不去的灾难。其影响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日常挑战, 要求加强协作和行动。气候引发的洪水、火灾和长期干旱如今像任何枪手或炸弹一样无情地导致家庭背井离乡。环境退化和水资源匮乏加剧了现有冲突并埋下了新冲突的种子, 在战时和战后对平民的打击最为严重。因此, 我们坚持认为, 应立即将气候和环境方面的考虑系统地纳入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每一个环节。

第三是支持人道主义人员和消除无国籍状态。菲利波·格兰迪高级专员和难民署的男男女女在最前沿满足人类需要。我们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他们必

须感受到并得到我们的具体支持。作为安理会，我们必须在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和杜绝袭击人道工作者不受惩罚的现象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斯洛文尼亚致力于继续通过发展援助消除移民问题的根源。我国一直在满足冲突受害者和流离失所者的需要，并且一直在协助难民安全回返。我国批准了1961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并且很快就会加入消除无国籍现象全球联盟。

如果遵循这三个方向，我们改变与高级专员的会议以及今后其他许多会议的基调和实质内容的机会会更大。让我们加紧努力。

塞克利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所作的深入而又发人深省的通报，以及他向我们传达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国希腊谨对高级专员持续不断、兢兢业业地履行其任务表示赞赏。我们充分和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工作，在他去年访问我国并与政治领导人举行会议期间，以及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框架内进行富有成果的互动期间，我们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世界目前正面临着当代最重大的人道主义挑战之一：由于武装冲突、暴力、侵犯人权、经济和社会不安全、粮食不安全、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数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些数字不言而喻，反映了暴力和生活条件恶化的恶性循环，对地区和国际稳定与和平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些数字也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类生活被其无法控制的力量颠覆。加沙、叙利亚、乌克兰、苏丹、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阿富汗、海地和委内瑞拉的持续危机是造成被迫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

请允许我强调以下要点。

上述所有冲突都有两个共同特点：冲突各方公然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缺乏问责。这两个特点都对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坚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有责任：第一，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第二，加强人道主义行动，以支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收容他们的国家；第三，找到有意义的解决办法，扭转流离失所的趋势。希腊将继续在安全理事会内外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作为仍在接收大量各种各样抵达者的欧洲联盟前线成员国之一，希腊为执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任务作出了贡献，按人口比例收容了大量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我国优先保护最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他们遭受性别暴力、剥削、与家人分离、缺乏受教育机会和长期心理创伤。我们根据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孤身未成年人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支助系统，包括提供住宿、医疗保健、营养、教育、监护和融入社会等服务。我们的相关战略立足于加强对儿童的保护，特别是保护他们免遭暴力和剥削，并通过重新安置和家庭团聚的多边协议，开辟与家庭成员团聚的合法途径。

管理难民潮带来了多重挑战。我们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优先事项是实现有效回返。此外，我们仍然严重关切犯罪走私网络的参与——它们利用移民路线上民众的痛苦，当然还有将移民工具化的令人发指的做法，这种做法完全无视国际法。

最后,我谨强调,在以武装冲突、气候紧急状况和侵犯人权行为为特点的危机中的世界令人沮丧的背景下,希腊呼吁采取切实行动,以做到以下各点:维护国际人道法;消除难民和流离失所危机的根源;选择当地和区域解决办法;扩大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规模;以及致力于保护被迫流离失所者。

斯威夫女士(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浦·格兰迪先生的全面通报和宝贵见地。塞拉利昂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特别是高级专员在援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承诺。

塞拉利昂对不断升级的全球流离失所危机深感震惊,这一危机影响到了难民、寻求庇护者和无国籍者。这一局势的紧迫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迫害、武装冲突、暴力、侵犯人权行为、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和其他灾难性事件迫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到2024年6月,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22亿,其中包括约72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这一激增反映,全球冲突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非洲承受着格外严重的负担,收容了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被迫流离失所者,其中包括近22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危机尤为严重,冲突加剧和对人口密集地区的定点袭击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

鉴于流离失所者面临的令人不安的趋势和日益严重的挑战,塞拉利昂希望强调三个要点。

第一,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确保根据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保护流离失所的平民。冲突各方不顾现有法律框架和安理会呼吁,特别是通过第1265(1999)号决议发出的呼吁,继续违反其义务。我们看到,在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克兰、缅甸和海地发生了有针对性的无情暴力,这些暴力往往涉及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等破坏性武器。在加沙,不加区分的轰炸、对民用基础设施的破坏以及对人道主义人员的袭击仍然令人深感不安,明显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妇女和女童继续首当其冲地受到武装冲突、流离失所和气候危机的影响。她们除了失去自主权、生计、教育和基本服务之外,还面临着不断升级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逃往乍得的苏丹妇女、戈马周边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刚果妇女以及呆在孟加拉国长期难民营中的罗兴亚妇女和女孩,她们都报告了令人痛心的遭遇。气候引起的灾害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脆弱性,也加剧了这种暴力的严重性。这种痛苦、不人道和持续存在的恐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们显然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第二,安全理事会和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必须加紧努力,以确保根据第1674(2006)号决议,将拯救生命的援助送达有需要的人。在人道主义供资减少和交战方对提供援助施加更多限制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对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支助必须建立在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坚定承诺以及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努力之上。在这方面,我们强烈谴责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袭击日益增多的情况,特别是在加沙和苏丹,我们呼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和平进程必须优先保护平民,并坚持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等核心人道主义原则。难民安全、自愿和有尊严地返回原籍国对于长期和平与稳定仍然至关重要,包括在中东地区。正如我们从高

级专员今天的通报中了解到的那样，那里有100多万叙利亚难民在经历多年冲突后正在返回家园。

第三，作为安全理事会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的共同主席和《妇女、和平与安全与人道主义行动契约》理事会成员，塞拉利昂赞扬难民署在该契约中发挥的领导作用。我们还赞赏它与妇女和平与人道主义基金建立伙伴关系，并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在非洲和中东通过“提升技能”方案开展协作。这些举措为流离失所者提供了获得培训、保护和庇护的机会；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并努力减少无国籍状态。我们还欢迎为解决无国籍问题所作的区域努力，包括非洲联盟于2024年通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国籍权具体方面和在非洲消除无国籍现象的议定书》。

最后，塞拉利昂再次紧急呼吁各国和发展伙伴满足流离失所者的迫切需求。难民署为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发出的102亿美元全球筹资呼吁资金仍然严重不足，迄今为止只收到了15亿美元。我们希望，今天的通报会能够推动采取行动，包括通过富有同情心和反应迅速的难民和庇护政策。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也请允许我感谢菲利普·格兰迪高级专员作了全面和令人信服的通报，对世界各地冲突局势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估，并就安理会在有效解决这些危机方面的关键作用发表了意见。我们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为保护和帮助世界各地数百万流离失所者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祝愿高级专员一切顺利。正如他所说，这可能是他对安理会的最后一次定期通报。

全球流离失所危机无疑已达到灾难性的程度。正如今天各位成员所指出的那样，全世界有超过1.2亿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不仅仅是统计数字：它们代表着被暴力和不公正摧毁的人的生命、希望和未来。危机的根源在于冲突、迫害、外国占领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这些人为的悲剧继续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家园，他们往往只剩下希望来支撑他们活下去。然而，即使在流离失所者人数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全球应对措施仍然不平等、不公正，而且严重不足。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应对自身的社会经济挑战，继续承担着最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尽管拥有更多的资源并负有道德义务，却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它们筑起有形的和政治的障碍，向最需要帮助的人关闭大门。

中东仍然深受未获解决冲突和非法占领后果的影响，导致世界上一些持续时间最长的流离失所危机。大会第194 (III) 号决议确认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仍未实现。长期占领和周而复始的暴力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巴勒斯坦难民潮。来自叙利亚、也门和该区域其他冲突地区的数百万流离失所者继续等待有利于自愿、安全和有尊严回返的条件。苏丹的局势同样令人震惊。持续不断的冲突已导致苏丹境内外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需要紧急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结束暴力，确保人道主义准入和援助。在其他地方，非洲、拉丁美洲、萨赫勒和欧洲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流离失所挑战。

在阿富汗，数十年的冲突、经济崩溃以及持续的不安全状况造成了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难民局势之一。四十多年来，巴基斯坦秉承同情和热情好客的光荣传

统, 接纳了世界上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难民群体之一。尽管面临相关的经济和安全挑战, 但巴基斯坦仍为数百万阿富汗人提供了住所、保护和机会, 并协助阿富汗公民在第三国重新安家。

现有的处理难民局势的架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想的, 已不足以应对今天的复杂现实。《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所载的公平分担负担和责任的原则基本上仍未得到落实。发展中国家收容了世界上85%的难民, 而许多发达国家却在不断缩小庇护空间, 收紧移民政策, 削减重新安置配额。这不是分担负担, 而是转移负担。迫切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反思。请允许我强调关键的几点。

第一, 我们必须解决流离失所的根源。安理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防止爆发新的冲突并解决旷日持久的冲突, 推动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必须坚决杜绝强迫流离失所。

第二, 必须落实公平分担负担和责任。向难民收容国提供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支助必须及时、可预测, 并通过赠款而不是贷款的方式提供, 因为贷款会进一步限制国家能力。我们还敦促捐助方大幅增加对难民署的财政捐助, 使之与不断增加的全球流离失所人数相称。

第三, 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制定多年期、有固定配额的重新安置计划, 同时确保重新安置进程高效、可预测和有包容性。拥有更多资源的国家还必须为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开辟更多法律途径。

最后, 必须优先考虑自愿遣返和可持续重返社会问题。资金充足的方案、对原籍国提供更多发展援助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为安全、有尊严的回返创造条件至关重要。

巴基斯坦坚信, 前进的道路是明确的。造成流离失所的主要因素——冲突未得到解决、外国占领和系统性剥夺权利——必须通过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集体意愿和有效行动来解决。这项义务不仅仅是一项政治义务, 而是深深根植于人类历史的道德要求。在伊斯兰传统中, 希吉拉 (Hijrah) ——先知穆罕默德 (愿他安息) 的迁徙——是面对迫害时追求安全、尊严和正义的永恒象征。伊斯兰历法正是从这段旅程开始——这提醒人们, 移民虽然诞生于苦难, 但可以带来建立在爱心、团结和坚韧之上的新开始。

面对今天的全球难民危机, 我们要以历史上堪称典范的做法作为指导和借镜, 奉行接受而非拒绝; 抱持希望而非冷漠; 不是筑墙而是搭建人性的桥梁。我们对今天在座各位的看法, 特别是关于安理会可通过积极努力和平解决冲突, 从而在解决难民危机方面发挥作用的看法感到鼓舞, 我们将与其他成员合作推进这一目标。

卡里乌基先生 (联合王国) (以英语发言): 首先, 我要强调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难民署) 和格兰迪高级专员的热忱领导。他带领本组织度过了全球变化的十年——冲突、气候冲击和不稳定日益加剧的十年。

所有这些因素都继续迫使人们离开家园，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当今世界，超过1.23亿人被迫流离失所。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必须聚焦于解决方案。我将重点谈谈联合国优先关注的三个领域。

首先，我们将继续竭尽全力解决流离失所的根源，包括战争、不稳定和镇压。我们将在各个层面，包括通过安理会，努力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并促进和平。我们将与国际伙伴合作，打击人口走私和人口贩运活动，此类活动利用弱势群体获取经济利益。就在本月，联合国成功主持了一次边境安全问题峰会，在会上我们促成了参与国达成协议，推动打击有组织移民犯罪和拯救生命的努力。

其次，我们将寻求解决地区和具体国家危机的办法，从乌克兰到中东的许多危机都是安理会的关注重点。本月，联合国主办了一次关于苏丹的会议，其人道主义和政治目标包括支持结束冲突和减轻对该地区的影响，我们感谢格兰迪专员以及联合国其他领导层的参与。在科克斯巴扎尔，我们资助了联合国难民署，以支持难民享有医疗保健、清洁水和卫生设施。我们将继续倡导为难民提供安全、有尊严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包括在九月举行的联合国罗兴亚人问题会议上。

第三，我们继续推动解决流离失所问题的创新方法。我们支持高级专员采取支持包容难民和自力更生的可持续应对举措，支持收容国对解决方案的自主权。我们期待12月召开全球难民契约会议，这是审查我们在2023年作出的为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提供更好成果这一承诺的进展情况的关键时刻，我们鼓励其他人加入我们为实现契约目标而做出的集体努力并继续开展这些努力。

总之，为了扭转流离失所现象日益加剧的趋势，我们需要集中精力解决我们今天讨论到的原因。联合国承诺与难民署及其他国际伙伴和机构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穆罕默德·优素福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索马里欢迎格兰迪高级专员出席本次会议，并感谢他所作的全面通报。这是他最后一次通报情况，我与其他人一起感谢他尽职尽责的领导以及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履行职责。

我们认可并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为保护和援助全世界逾1.22亿被迫流离失所者——这一数字史无前例，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一倍多——所作的不懈努力。在这方面，我想强调这一全球挑战的三个关键方面。

首先，当前流离失所危机的规模和复杂性需要前所未有的协调和应对。我们目睹的流离失所现象的规模正在考验我们人道主义系统的极限。仅在苏丹，就有数百万人背井离乡，而在加沙，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面临流离失所、甚至是多次流离失所的情况。难民署在这些危机当中的存在以及在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对于提供保护和协调人道应对措施仍然至关重要。

其次，我们深为关切地注意到，有记载表明国际人道法受到侵蚀。我们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仍在记录平民伤亡不断增加、饥饿和性暴力被用作武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蓄意袭击的情况。我们必须加强对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原则的承诺。安理会第1265（1999）号、第1674（2006）号和第2417（2019）号决议为保护

平民和确保人道准入提供了框架。然而，如果不重新致力于这些原则，我们就有可能辜负最需要我们保护的人。

第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解决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冲突和不平等的交织造成了持续的严重脆弱性。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持久解决方案，同时满足弱势群体的具体需求。必须与受影响社区和收容国密切协商，实现安全、自愿和有尊严的返回以及当地融合和重新安置。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特别是在预防和应对流离失所环境下的性暴力方面。我们呼吁提供持续的国际援助，以确保回返可以持续，基本服务和生计得以恢复。

索马里认识到难民署面临严重财政困难。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和捐助者加大慷慨支持的力度。充足、可预测和灵活的资金对于难民署履行职责和有效应对日益增长的流离失所需求至关重要。

每个难民，无论背景或技能如何，都应该获得有尊严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法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菲利普·格兰迪先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这是他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负责人期间的一项传统。他直言不讳地概述了寻求安全的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并提出了减轻他们痛苦的建议。

法国赞扬高级专员在近十年任期内完成的出色工作。我们对他致力于为难民、无国籍者和被迫流离失所群体服务表示敬意，并通过他向在世界各地执行难民署任务的男男女女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我想到的是那些在执行这项日益艰难的任务时受伤或丧生的人，无论是在叙利亚、黎巴嫩、苏丹、乌克兰、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还是在他们的工作发挥关键作用的任何地方。

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和破坏，也就是造成大多数被迫流离失所的根本危机和冲突，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难民署处理这些后果。在危机越来越多、违反国际法和保护平民的状况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它当然会觉得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高级专员，法国在本安全理事会重申对难民署工作的政治承诺的力量。

众所周知，难民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临时成立的，目的是帮助数百万逃离或失去家园的欧洲人，希望找到持久解决难民、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问题的办法。这一任务已多次延期，大会于2003年将其无限期延长（大会第58/153号决议）。被迫流离失所现象继续增加。它仍然是危机和冲突的主要后果之一，平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2015年，6000万人被迫流亡。十年后的2025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这一变化反映了世界正面临越来越多旷日持久的冲突以及粮食不安全、健康危机、侵犯人权、气候变化和经济冲击的综合影响。

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责任仍然是支持流离失所者和收容他们的人。这是事关团结和人道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处于安全和维和工作核心的问题。正如高级专员所说，大幅削减资金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人类悲剧、不稳定和被迫流离失所的增加。那些我们帮不到的、已经流离失所的民众将别无选择，只能再次流亡。我

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集体行动，通过让当地行为体以及难民的收容国和过境国参与进来，提高效率，扩大影响。

2023年，法国与约旦、日本、哥伦比亚和乌干达共同主办了全球难民论坛。我们当时明确承诺支持难民署和难民到达的第一批国家，并通过庇护能力建设和进入该领土的法律渠道——重新安置和人道主义、学术和专业走廊——来分担责任。法国支持多方利益攸关方倡议“与她们在一起”，在流离失所的所有阶段保护和包容难民妇女和女童，该倡议得到许多伙伴的支持。

我们的集体行动反映在《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获得的支持有所增加。该契约呼吁分担责任，增加对收容社区的支持，为融入社会或自愿返回提供具体解决办法，从而为我们的联合行动提供了框架。这是对稳定的投资。必须使难民能够有尊严地发挥潜力，并支持收容他们的社区——它们往往要作出大量牺牲——这是当务之急。

我谨代表法国再次在安理会成员面前感谢高级专员坚定不移地努力支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所有收容他们的人。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请格兰迪先生发言，以便他回应所发表的意见并作最后发言。

格兰迪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表达了赞赏和支持，我都充分注意到了。

（以英语发言）

我只想对今天提出的看法补充几点意见。

首先，我想说，我不仅赞赏各位成员今天向我们表示的支持，还要特别赞赏许多人申明遵守国际法和难民法的重要性，包括在与接收难民和处理寻求庇护者有关的问题上。如果我说这是我和本组织的核心任务，应该不会让成员们惊讶。我不仅赞赏成员们的发言，也相信它们将转化为遵守难民法、尊重逃离冲突或迫害的人在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权利的实际政策。我也理解，正如我在开场发言中提到的那样，各国在作出这些选择时必须平衡许多考量，包括安全、社会影响和可能的不稳定。我还相信这些考量将与国际保护难民措施相平衡。

应对日益复杂的人员流动的办法自然必须考虑到管控和确保成员国公民安全的必要性，但也只有在这些管控之外再采取其他措施为流动人员提供机会，它们才会奏效。正如我们多次说过，这是管理这些路线上非常复杂的人口流动的唯一办法。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其他人提到《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正如成员们所知，也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大会在2018年确认的这一契约（大会第73/151号决议）实际上是提供给各国的一个工具箱，用来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人口流动。这个工具箱应该与联合国在同一星期内确认的另一个工具箱（大会第73/195号决议），即《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一起得到考察和使用，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许多成员提到了危机和形势,包括难民形势,我在最初的发言中只是简要点到、或是完全没有提及这一点。遗憾的是,由于发言时间有限,我们无法提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危机。我想到了几十年来一直在破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危机。实际上,就在我们发言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果难民正在涌入邻国。另一个正在经历冲突和流离失所的地区是西非的萨赫勒中部,当地民众不仅在国内流离失所,而且逃往邻国,包括西非的沿海国家。一些成员提到委内瑞拉持续的困难局势,这导致拉丁美洲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和难民流离失所。还提到了阿富汗。阿富汗的人权形势仍然错综复杂,数百万人面对的实际困难也很复杂——数百万阿富汗人在该区域流离失所,尤其是在巴基斯坦和伊朗。

我可以继续举例,但我只想表明,我们在所有这些地方以及其他地方都有参与。正如我一开始就说过、而且几乎所有安理会成员都提到的那样,因为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分工,我们没有介入的唯一一个地方当然就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尤其是加沙。我注意到,安理会成员多次提到这场灾难性的危机,只是为了提请注意,尽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没有介入,但是作为一个大型人道主义组织的负责人,我完全赞同秘书长和其他一些机构负责人表示的关切和对急需恢复停火、急需释放人质以及急需使遭到严重削弱的脆弱的和平进程重回正轨发出的呼吁。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避免冲突复发,甚至是在停火之后复发,防止再次给平民造成影响。

一些安理会成员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冲突日益复杂的问题。例如,圭亚那代表提到犯罪和帮派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造成拉丁美洲、萨赫勒以及其它地方流离失所的主要因素之一。考虑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安理会成员和我们应对这场危机的行动。气候危机、极端天气事件、干旱、洪水以及资源枯竭的影响也同样重要,这些也是许多冲突的根源——想想非洲之角,再想想西非以及世界上的其它地区。这是人道主义机构必须更新其应对危机方式的一个领域,但是它也需要安理会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

我感谢那些提到继续为人道主义组织、尤其是难民署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性的安理会成员,几乎所有安理会成员都提到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形势的严峻性也不为过。就在这段时间,我牵头了一项内部工作,最终可能导致我领导的这个组织的能力被削减多达三分之一。我们是联合国系统内部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之一,同类机构的一些负责人也在牵头类似的工作,其中包括我们合作非常密切的一些组织,如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前几天我曾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谈到该问题。我应邀在一次有关流离失所问题的非常有益的活动上发言。那或许是讨论这些问题的论坛,但是安理会成员也必须明白,裁撤诸如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以及退出危机发生地也将影响到和平与安全事务。这是因为我们行使职能的能力将大大减弱,毕竟我们在这些地区发挥了一种稳定的职能,这不仅体现在我在开场白中提到的当前的人口流动上,也体现在这些地区的稳定上。如果目前许多捐助国不幸宣布冻结和削减的趋势继续下去,人道主义系统将遭到严重削弱。丹麦大使已雄辩地谈到这一点。

我只是不得不指出——并非反对,而是进一步指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将无法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正如我已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将

用较少的资源做较少的事情。我们已经在用较少的资源做较少的事情。我们已经在裁减——我代表难民署这样说——教育和保健项目，以侧重于某些部门。我们已经在削减——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塞拉利昂代表和其他代表都提到了——宝贵的保护方案，这些是受到所有安理会成员高度关注的旨在打击性别暴力的方案。许多这些方案是由已经不复存在的资助倡议提供资金的。当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以可能的最佳方式、最具战略性和最有效的方式，用较少的资源做较少的事情。我们将抓住难民署内部的每一个机会，同时也将抓住紧急救济协调员汤姆·弗莱彻领导的人道主义重启以及秘书长的联合国80周年倡议背景下的每一个机会。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持强有力的实力、存在以及有效性，但是如果这些趋势得不到扭转，我们的处境将非常艰难。

和安理会成员一样，我听到很多人在谈论必须重新平衡国防开支，应对全球可能出现的贸易紧张。但是，我很少听到政界谈论双边和多边援助以及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减少将给受影响的个人和国家以及国际关系造成的可怕影响。因此，请允许我稍作详述，以便向安理会保证，我们将竭尽所能，以可能的最佳方式应对这种情况。可持续的对策是我们为应对该问题而采取的举措之一，但是办事机构、方案以及业务将会减少。因此，我非常感谢丹麦和韩国等国宣布将保持稳定和灵活的供资，并希望其他国家效仿它们的榜样。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强调这个具体要点。

最后，就我现在的身份而言，我可能将离开安理会——不过我还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安理会需要我，我就在这里——我愿说，参加本次辩论会以及认真倾听所有安理会成员的发言再次证明了我多年前学到的一点，当时我还不是高级专员，而是坐在其他高级专员身后聆听他们的发言，那就是：安全理事会正在开展和应该开展的工作与我所领导的难民署这样的组织的工作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所领导的组织纯粹是人道主义性的，但是它处理的是政治危机和冲突造成的问题。这种关联非常重要，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将继续敦促安理会成员尽最大努力——因为我们确实也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挑战——尽可能团结一致，以努力结束这些造成流离失所危机的冲突，并且铭记，正如许多安理会成员提醒我们的那样，找到这些战争的解决方案也非常重要，因为超过70%的难民身处贫穷或发展中国家。1.23亿难民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就是在邻近危机发生地的国家流离失所。为此，如果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危机的解决可迅速减少难民人数。

然后，请允许我重复我说过的话。继续保持介入。努力尽可能保持团结。承担某些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在我应对这场危机的长达40多年的漫长职业生涯中，我看到，对于承担必要的风险、特别是为恢复和建设和平而承担风险的兴趣日益减退。我曾提到叙利亚，我曾提到缅甸——一个更加复杂的局势——我还可以提出其它我们可以着手寻求解决方案的情况，但是国际社会有点不愿承担风险，而这些风险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向安理会提出这一点，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风险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也是抱着对各位安理会成员始终给予我支持的感谢说这番话的。

不幸的是,今年难民署将迎来成立75周年。有人提到,难民署成立于1950年。这不是一个庆祝的日子,而是一个也许应该反思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尝试寻找某种灵感以共同应对挑战的日子。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格兰迪先生与安理会分享补充意见,并再次赞扬他领导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所做的努力。

中午12时10分散会。